

第五章

风险投资：

智能与信心的结合

在内地声势浩大的招商引资活动中，人们重视的往往是战略投资伙伴，而当一间不见经传的网络公司突然在美国纳斯达克成功上市的时候，风险投资才获得内地资本经营者的广泛关注。事实上，风险投资在中国内地已经历了起步、辉煌、挫折到平稳发展的几个过程，市场运作正趋成熟。

1/ 在国内的发展进程

风险投资在内地最早出现是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起步并不比欧洲和日本落后。1985 年，中国新技术产业投资公司、中国招商技术有限公司、江苏省高新技术风险投资公司、广州技术创业公司共同成立了内地最早的风险投资公司。1997 年至 2001 年，内地风险投资获得较快发展，特别是在 2000 年下半年，受到美国科技股持续上扬及内地二板市场即将开设消息的影响，曾出现一个爆炸性的发展，风险投资额达到创记录的 5.18 亿美元。但随着美国纳斯达克市场持续低迷、内地二板市场迟迟未开，2002 年的内地风险投资运作陷入低潮，市场规模萎缩，全年风险投资额降至 4.18 亿美元。

然而，随着互联网行业走出困境，全球科技股持续上扬，2003 年共有 170 多家风险投资机构投资在内地的 341 个投资项目（包括非第一轮投资的投资项目），总额达到 10 亿美元，相当于 2001 年和 2002 年的总和。在 341 个投资项目中，电子讯息行业包括计算机设备、网络 / 通讯、半导体和其他 IT 行业有 81 项，占 24%；其次是生物、医药和医疗器械行业共 72 项，占 21%；而传统制造业和金融服务业各有 18 项，占 10%。

目前，内地风险投资机构包括 160 多家风险投资公司和 150 多家风险投资管理公司，注册资本达 180 亿元人民币；境外资本在国内设立的风险投资机构也有 30 多家。单在北京、上海、深圳 3 个城市便已有 150 多家风险投资机构，占总数的 60%，拥有的资本约占总资本的 70%。风险投资在中国内地已经进入了稳定的发展阶段。

近年来，内地政府十分重视风险投资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可以发挥的作用，推出了一系列有利于其存在和发展的政策及措施：2003 年 3 月 1 日实行《外商投资创业投资企业管理规定》，为海外创业投资创造了更加宽松的环境；推出《指导外商投资方向规定》和《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等明确的指导资料；为外商投资企业提供优惠待遇；逐步推进创业板市场的建设，为风险投资开辟进出渠道；以及于 2004 年 3 月，由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确定北京产权交易所和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天津产权交易中心一起作为首批试点单位，发布中央企业国有产权转让信息，并组织相关产权交易活动，让海外风险投资有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2/ 外资不断涌入

2002年，内地风险投资与外资风险投资机构的投资表现可谓平分秋色。但到了2003年，由于外资风险投资机构扩大了在中国的投资，占风险投资总额的80%，使两者之间的差距拉远了。外资风险投资对投资内地信心十足，主要原因有二：

高科技产业的结构转移

中国内地拥有制造成本优势和巨大市场，自然成为世界高新产业制造链转移的主要目标基地，吸引了大量资金及技术进入；其中电信设备和 IC（Integrated Circuit，集成电路）等产业表现尤为突出。

前期投资取得可观回报

早期依靠外资风险投资启动，并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的内地三大门户网站新浪、搜狐及网易，从2002年下半年开始，通过开展短信等新业务，实现整体盈利，估价上涨了数十倍，甚至上百倍。加上不久前几家从事电子商务的网站在美国成功上市，遂吸引更多投资。2004年初，美国老虎基金向内地 B2B

（Business to Business，企业对企业）电子商务网站投资了近2000万美元，另有一家内地 B2B 网站也获得了8200万美元的私募资金支持。事实上，境外投资基金将会继续成为中国内地风险投资的主力。来自欧美等国的一些著名投资机构的高层人士和专家，对中国内地风险投资业未来发展的巨大潜力十分看好，纷纷表示将投资在中国的高成长企业。此外，以色列希望与中国共同发展风险投资产业，计划与中国签订一个金融方面的合作草案，以支持高科技产品的商业化和产业化。而以色列的一个民间风险投资基金组织亦将在中国设立代表处，并计划带来2.5亿美元的风险投资基金。

另外，由欧洲29国成员组成，包括650个风险投资基金的欧洲创业投资协会也表示，中国将成为其投资的重点区域。

3/ 实际投资环境

内地的风险投资经过10多年的发展，虽已取得一些成效，但仍需面对多方面的挑战：

退出渠道亟待完善

截至2003年底，内地1500家获得创业投资的企业中，九成的创投资本还没有实现退出。理论上，风险投资可经由三个渠道退出：设立离岸公司通过海外或境外红筹上市、内地A股市场买壳上市及股权转让。但这些方式会导致筹资成本有不同程度的增加。因此，内地还未有一个真正让风险投资从容退出的渠道。

运作机制有差异

内地风险投资机构基本上采用公司制，而大部分的海外风险基金采用有限合伙人制；体制的不同造成了税收、资金流通及运作模式的分别。因此，海外风险投资很少与内地风险投资机构合作成立合资公司，一方面影响海外风险投资熟悉中国内地投资环境的进程，同时也影响内地风险投资机构利用自身优势发挥桥梁作用。

选择投资时机受到限制

由于对中国内地不太熟悉，海外风险基金难以挑选和评估有可能获得更大收益且数量众多的早期或中期项目，也无法在投资后为这些项目提供全方位的增值服务。为了减低风险，只能选择上市前的公司即后期项目进行投资，以发挥它们的资金优势。

合作伙伴难找

海外风险投资专家寻找合作伙伴时一般要看其 10 年的业绩，但内地引入风险投资只是近 10 年的事，加上目前内地的民族创业投资企业并不发达，企业家制度尚不成熟，海外风险投资者很难找到合适的本土合作伙伴。

此外，根据以往的经验，在内地从事风险投资，必须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耐心等待成果

由于风险投资必须经历选择、竞争和淘汰的过程，因此一般需时 3 至 7 年。一些风险投资公司在 1999 年获悉内地要开设创业板后，便用高价收购准备在创业板上市的企业，结果造成资金的积压甚至损失。

慎重选择项目

由于无形资产评估中存在着众多的不确定因素，即使由财务专家做出详尽的财务分析，但仍然不能保证项目成功，最重要的是依靠风险投资者本身的知识、经验、胆略和判断力。

避免个人专断

创业管理团队的配制是影响项目成败的重要因素，除了须确保团队具备较强的组织、财务和营销能力外，还要建立合理的法人治理结构，既要给总裁充分的授权，又要防止内部个人控制，尤其在投资、借款、担保等重要项目上。

适度介入管理

风险投资者应当适度介入风险企业的管理，利用本身的知识、经验、关系等尽力支持创业者创业；还要注意监督企业依法运营。

共同协力创业

由于风险投资专家和创业者的目标和角度不尽相同，在增资、关闭、上市、出售等企业发展的重大问题上出现矛盾是正常的，但双方应尽量通过协商解决矛盾。

依法运营

特别是准备上市的公司，应该按上市公司的要求建立行政管理和财务管理制度。每一个风险投资基金都有自己的投资方向和策略，能成功在中国这个庞大的市场中找到合适的项目，诚然是每一个基金管理者的奋斗目标。

专访 汇亚资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及执行副总裁 王干芝

众所周知，投资有一定的风险，然而却造就了一个专门凭借风险而赚钱的行业——风险投资。从事风险投资超过 15 年的王干芝，对风险投资在内地的发展有什么展望？且看一下王干芝（以下简称“Simon”）于 2003 年 3 月 2 日电台节目内，如何回应作者（以下简称“王”）与吴明林（以下简称“吴”）的提问：

风险投资提升香港工业的竞争力

吴：我们今天访问的嘉宾非常特别，以往从未采访过这类人物。究竟他从事什么行业呢？就是所谓的 VC（Venture Capital，“风险投资”或“创业投资”）。这位嘉宾是王干芝先生，他是汇亚资金管理有限公司和香港科技投资有限公司董事及执行副总裁。还有一些资料更厉害。

王：他是 2001（年）和 2002 年中国最活跃的风险投资人之一；连续两年上榜了。听说每年只有一两个香港人（可以入选）。

吴：我认识 Simon 很久了，他从事这个行业很久，（同）行里几乎没有人不认识他。Simon，说说吧！

Simon：（多）谢啦，你们过誉了，不敢当。我从事这个行业已经 15 年。我从（香港）中文大学物理系毕业，进行了两年研究（工作），然后攻读 MBA（Maste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工商管理硕士），毕业后进（入）美国银行工作了数年，后来去了康力集团。我管理过两间厂，一间做通讯设备，即 PABX（Private Automatic Branch Exchange，专用自动电话交换系统）和 answering machine（电话录音机）之类的产品；另一间生产电视机。之后，我在中文大学读 MBA 时（认识）的教授冯国经博士从美国麻省理工大学（MIT-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回来，和几个朋友创办了香港科技投资有限公司，邀请我加入。我进去以后一干就干了 15 年。

吴：里面很多成员是 MIT（毕业）的，（但）你不是 MIT 的。

Simon：当时我们有 5 个人，除了我，（其余）4 个都是 MIT（毕业）的。

王：15 年前，风险投资在香港并不流行。虽然在美国历史很久了，在香港却是一件全新的东西。你当时是从什么地方偷师，怎么入行的？

Simon：当时香港生产力促进局——HKPC (Hong Kong Productivity Council) 正研究如何提升香港工业（的竞争力），（获）邀请来港的美国著名“VC 之父”，黄安公司的投资者 Peter Brook 提议设立类似风险投资的公司来提高香港的工业（水平）。因为冯国经博士与 Peter 是哈佛的校友，于是与 Peter 合作成立了一家风险投资公司。开始时大家都不懂如何操作，我们（公司）曾经派人到 Peter 那里学习。所以说，我们是正统出身学习如何做 VC，（并）引进美国的做法。

吴：（风险投资）究竟是做什么的？首先，是不是有人入股，将钱投入（到 VC 公司），（然后由 VC 公司）物色合适的项目进行投资？至于何时（有）收成，有时要等公司成长壮大。

Simon：没错。

吴：需要入股吗？

Simon：（需要）入股。与银行不同，银行是贷款，我们则只是入股。

王：创业投资公司又称为“基金管理（公司）”。有人入股公司，（公司就）拿别人的钱去投资，（然后）收取基金管理费。如果被投资的公司成功，（基金管理公司）还能得到更多的利润。所以很多人都说（基金）管理人用人家的钱赚钱，use other people's money（简称 UPM，用他人的钱）。

吴：有人肯入股（VC 公司），主要是看重以往的业绩，（因此）track record（过去的业绩）很重要。

Simon：绝对正确。

中国和美国的一级大学毕业生水平

王：Simon，我知道在初期，你们公司的投资遍布东南亚，甚至整个亚洲地区，（但）从与你的交谈中了解到，近年你们（已）完全从其他地区撤出，不再投资，而把资金全部集中投入到内地。是这样吗？

Simon：是的。1997 年以前东南亚的发展非常蓬勃，但在 1997 年金融风暴之后经济发展缓慢起来。个中原因很多，例如各国自身的经济问题等，最重要的影响是中国内地的崛起。中国内地的冒起影响深远，包括目前香港的问题，同时令东南亚国家、亚洲四小龙失去了竞争力。中国内地的科技能力和廉价的人力资源优势，远远超过东南亚国家和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地区。所以在内地投资多，其他地区相应少了。

王：中国除了廉价的劳动力和土地之外，技术人员的供应也很丰富。例如每年都有超过 100 万个大学生毕业。

Simon：中国大学的水平非常高。我认为清华大学学生的水平比哈佛高。

王：不会吧？我是哈佛（毕业）的。（笑）

Simon：因为中国从 13 亿人口中挑选最优秀的人进入清华大学，美国（仅）从贰亿伍仟万人口中挑选最优秀的人进入哈佛。而且美国优秀的学生不一定将哈佛作为首选，他们可能会选 MIT、Stanford（史丹福）、Princeton（普林斯顿）或 Yale（耶鲁）。而内地各省前 10 名考生和前 100 名考生中八成在清华。真的是不得了的一个现象。

吴：中国的技术人员和高科技人才的供应并不缺乏。

Simon: 绝对不缺乏。中国是很重视科技的国家。新中国成立后科委的地位很高，大学里科技课程的水平很好。前 Berkeley（柏克莱大学）校长、清华大学 advisory committee member（咨询委员会委员）田长霖教授生前对我说，清华的设备比 Berkeley 好。

吴：多个因素结合起来，造就了中国的投资环境。外来的直接投资很多（都）流入了中国。Simon，你是从什么时候看中内地有投资机会，开始投资内地？还是从一开始就进入内地呢？

中国的制度每天都在进步

Simon: 我们从 1986 年开始进入内地。中国正式开放是从 1987 年、1988 年开始的。当时没有人明白什么是风险投资，而且国营企业的体制还没有改革。我们曾经尝试和一个企业谈妥条件了，回到香港备齐文件准备签约时，突然发现（该）企业（的）整个领导班子换马了。之前已经谈了一年多时间，重新再谈（会）耗时太长，于是我们放弃了。所以有数年我们停止了（在内地投资），而投资到香港，之后才重新回到内地（投资）。

吴：中国现在的体制完善了许多，是吗？

Simon: 中国的制度每天都在进步。

王：（中国）关于风险投资的法规刚刚出台，以前你主要依照《中外合资企业法》来操作的，你们控股吗？

Simon: 以前，我们（是）迫不得已要控股，一般的投资我们尽量避免控股。因为不控股，管理层认为公司是自己的，会拼命的干；如果控股了，他们会干别的事情，对公司的发展不利。刚刚你说得很对，我们将来一定要 exit（退出），把企业的股份卖出去才能赚到钱。

王：要（在这里）解释一下为何（Simon）这么说呢？因为股东投资有期限要求，例如投资者希望（在）入资后 7 年左右的时间回收资金，（股东和 VC 公司便）在合约中约定 7 年内将资产 cash in，就是套现。

Simon: 没错，你说得很清楚。其实你是我的老师。（笑）当时我们惟一的退出方法就是在香港上市，而要在香港联交所上市我们必须控股。所以说迫不得已要控股。如果香港公司到内地与香港公司合作，股份都在外企手中，（不控股）没问题；如果投资在内地的国有企业或者乡镇企业的话，就必须控股。

吴：随着内地越来越多企业转变成股份制（公司），是不是就可以不控股呢？而且在内地也可以上市，不一定要在香港上市（退出）。

建议香港与内地建立跨地区创业板

Simon: 是的。在中国的风险投资有一个弱点：股市还未能配合到风险投资。对风险投资的发展而言，退出（的）渠道非常重要，没法退出就没法投资。在内地的 A 股上市手续比较复杂，而且不容易。要在国外上市我们就必须控股。

很多风险投资公司在国内投资的企业，由于既不能到香港和国外上市，又无法在 A 股上市，（资金）积聚在一大批的企业中找不到出路。这是（在内地投资的）主要问题。在香港，创业板（对风险投资）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我一直主张香港的创业板要和内地的证监会商谈合作事宜，因为内地的企业能在创业板上市是（风险投资退出的）最好办法。如果内地开设创业板，香港创业板的生意一定会立即大幅下降。香港在金融业方面能够发挥很大作用。如果香港的创业板做得好，我们将内地的高科技企业和民营企业引来上市，香港的经济一定能好，因为这些都是非常有前途的公司。如果内地开设创业板，这些企业肯定不会来香港（上市），因为成本高，要求严格。（香港的）监管严格本（来）是好事，但企业当然不希望如此。同时，内地的资金很多，香港的 PE（price/earnings ratio 市盈率）低而内地高。多个原因导致内地企业不来香港而在内地创业板上市。所以我们建议香港和内地合作建立一个跨地区的合并的（创业）板，内地公司在香港上市等于同时在内地上市。对双方都有利。

王：内地的创业板原本打算设在深圳，现在推迟了，是不是给香港时间去应对呢？

Simon：你说得对，我曾经多次向中央提议照顾香港的利益，推迟设立内地创业板。（因此，）香港必须行动起来配合中央的好意。如果我们停滞不前，中央就会受到压力，因为创业板迟早一定要设立。

吴：人们是不是对香港创业板的信心不足呢？因为很多企业上市不久就跌破招股价。

Simon：是时机的原因。主要是受到 dot com bubble（网站泡沫）的影响，不只香港，美国也一样，大部分在（网站泡沫）期间上市的公司表现都不好。但从长远看，中国有许多优质的民营高科技企业基础扎实，前景非常好。

王：看看美国 NASDAQ（纳斯达克）也并非每间公司都表现得很好，只不过有些明星企业冒出，而香港（创业板）成立以来没有什么明星企业出现，让人感觉每家创业板上市公司的表现都差强人意。（只要）这些公司一直发展，将来一定能有所表现的。假以时日，香港创业板定能发挥自己的作用。

吴：国内会计准则和企业管理体制的进一步完善也能加强我们（对创业板公司）的信心。Simon，风险投资顾名思义风险很高，你们是不是赌性很强的人呢？投资正确当然好，如果投资错误的话，岂不倾家荡产？

在亚洲投资不能冒险

Simon：这要从两方面看，香港和美国不一样。在美国投资于如硅谷之类的高科技企业，其技术真的是高科技，在世界上绝无仅有。一间公司一旦成功，回报率能达到 100 倍、200 倍。但在亚洲，企业的技术也许是美国 10 年前就已经产生的，企业不可能赚上 100 倍、200 倍的利润，顶多是 20 倍、10 倍，甚至三四倍。所以，在亚洲投资和在美国投资的心态完全不同。在美国，投资 10 个企业只要有一两个成功就能赚大钱；而在亚洲，如果投资 10 个企业（当中）有七八个失败的话，损失会很惨重。因为盈利的一两个企业只能赚三四倍，根本无

法弥补在其他企业投资上的损失。我们在亚洲（投资）一定要安全稳健，千万不能冒险，这是我们的宗旨。

吴：这么说，现在的做法和你们的企业名字正好相反，“风险投资公司”却千万不能冒风险。

Simon：没错。

王：跟 Simon 很熟了，告诉你（也不怕），以前大家提到香港的风险投资家，都说你们名不副实，根本没有冒风险。（笑）怎么去识别企业有没有风险呢？例如欧亚农业，貌似稳当的行业却让投资者吃了大亏。怎样避开（这些隐蔽的风险）呢？

Simon：这是另外一个层次的风险，叫道德风险。刚才我们讨论的是技术风险、市场风险，在内地投资则要多防范一种风险：道德风险。由于内地市场经济刚刚开始，道德风险是比较普遍的；而且由于文化上的差异，人们习惯于夸大，例如亩产万斤粮食等等，“虚报”并不被视为错误。对此我们有（一个）对策——比较，不停的比较！例如，一间栽培花的公司，亩产多少、单价高低都可以和其他栽培花的公司比较。有 10 间这样的公司，我们就走访这 10 家公司，从中发现异常，并避免与不诚实的公司合作。

吴：就是要依靠大量的 research（调查）。

风险投资的关键在于人

王：我也曾经涉足投资领域，很多人认为决策者或者大股东很关键。如何去识别大股东（的优劣）呢？

Simon：其实从事投资行业就好像做侦探似的，我们要研究（大股东的）整个历史纪录，包括接受的教育、同学、朋友、父母、伙伴等等，有机会的话我们还（要）和他的同学、朋友接触，了解（他们）过往的诚信如何。乍听起来挺夸张的，但实际上我们真的进行过这些工作。

吴：非常仔细地去了解一个人。但是了解一个人的心真的很难，也许伪装了 40 年，到第 41 年才露出真面目。

王：伪装了 40 年，可能假的也变真了。（笑）

Simon：如两位所说，在内地投资会碰到以上的问题，但现在内地还有一群人，就是所谓的“海归派”。他们代表的是另一种文化，通常从北大、清华、复旦毕业以后到麻省理工、哈佛、Stanford 读博士并留在美国工作了六七年之后回国创业。我们很喜欢他们这种人，因为多年在美国，让他们具备了西方的道德观念，投资在他们身上风险相对较小。

王：（风险投资）基本上是投资在人（的）身上。创业基金看重的是人，因为创业时期通常只有（创业）建议书，尚未有实质的东西。无论计划多么完美，最终得靠人去实现。判断（是否投资的标准）关键是人。Simon，我想了解在

目前中国众多的高科技行业当中，例如通讯科技、电脑科技、生物科技等等，你认为哪个行业（的投资）机会多，还是每个行业都有（投资）机会呢？

Simon: 内地的工业（体系）和香港大不相同。香港的工业通常指成衣、玩具、电子，非常狭隘。台湾的工业宽泛得多，包括诸如汽车、汽车零件、IC、IC 设计、成衣等等。内地的工业更加多样化，包括农业（相关产业）、医药等，涵盖了所有的行业，门类可与美国匹敌，从而导致投资的范围宽广，机会遍地。

吴：目前你较关注哪个领域？

Simon: 我们会关注不同的领域。我们是“机会主义者”，不论哪个行业，只要能赚钱就投入资金。我本身不是每个行业都了解，但公司有各行各业的专家，有读生物工程的、有学 IT 的、有传统工业出身的，几乎涉及各个领域。

参与管理是风险投资的要诀

吴：初入内地时两地的文化不相同，你是怎样克服文化、语言、沟通上的差异呢？

Simon: 这是要付出代价的。我自己在内地的第一个投资（项目），投资前公司连续数年盈利，表现不错，可是投资以后接连亏损。公司的财务报表曾经（过）香港的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应该不会有诈。我们研究了很久，发现厂长有很大责任，于是要求省政府更换厂长，但 3 年都没有实现。最后我们拿出证据据理力争，终于换了新厂长，公司马上就恢复盈利。（克服文化差异）需要投入精力、时间甚至金钱。当时我们以为这家企业必垮无疑，甚至将它从公司的账目上 write off（注销），谁知道今天它仍然表现良好，赚了大钱。

王：这是风险投资的要诀之一，即参与（被投资企业的）管理。参与管理非阻挠，而是了解和支持。例如公司想开拓某个市场，（VC 公司应该）为企业介绍渠道、牵线搭桥。这对企业的助力很大。

吴：要注意不能让（被投资）企业认为（VC 公司）在干预、watchdog（看门狗，意思是监视）监督它的日常工作，这需要很高的技巧。

Simon: 实质上，这是人与人的关系。我们（风险投资专家）的性格一般都不会很激烈，而是有理有据地讲道理。

吴：不断的逐步提出建议，而不是争吵。

王：在世界各地，创业基金在被投资企业中一般占有少数份额，希望大股东主动地推动公司发展。作为小股东，采取什么方式、如何影响大股东，也需要技巧。不能让对方觉得是干涉。**Simon**，最近翻阅报纸，发现你曾经预言 50 年后世界只剩（余）两个科技中心，美国硅谷和中国北京的中关村。

内地科投前景乐观

Simon: 个中是有原因的。中国经过 20 多年改革开放，经济已经发展到足以提供应用高科技的平台。中国历来重视科技，新的领导班子 9 位常委都是工程师，其中 4 个（毕业于）清华。其他国家以律师之类居多，从来没见过有如此的阵容。另一方面，虽然美国 3600 间大学都想建立自己的科技发展中心，但其中成功的只有两处：一是 Boston（波士顿），一是硅谷。原因何在呢？在硅谷附近集中有 Stanford、UC Berkeley（柏克莱大学）、加州理工大学等优秀学府；Boston 亦然，哈佛、MIT 等大批名校坐落周围。人才集中令信息交流迅速。研究过程遇到什么问题可以求助于从事类似研究的同学，马上得到解决。孤军奋战难以成功。至于中国，有一个奇特的现象，大学非常集中。例如上海有 60 间大学，(如)上海交大、复旦；北京有 80 间大学，(如)清华、北大；西安有 45 间。还有如南京、杭州、武汉等等，都是高校云集。当优秀的高等学府集中时，高科技的发展会变得容易。这是最重要的原因。第二个原因则是“海归派”，我们不应轻视“海归派”的作用。目前是“海归派”的第三次回流。第一波发生在 1920 年前后，胡适、鲁迅、周恩来、邓小平等都在那时回国，改变了中国人的思想，“五四”运动也在那时开始（的）。第二波是 1950 年开国之后，如钱学森、钱三强、钱伟长、王淦昌等等，它们改变了中国国防科技的力量。现在是第三波，数量更大，素质更高。他们回国后发展科技、进行创业。投资在这批人身上，成功的机率非常高。台湾就是很好的例子。为数不多的留学生回去后已经能创立新竹科技园区，令台湾的经济起飞。内地的这批留学生更胜一筹。

吴: 其规模是（台湾的）数十倍。以往回流的比例没有现在大。以前 10 个出国的只有一两个回国，现在有五六个。国家有前途、有发展，整个形势都不同了，于是大家纷纷回国。

王: 如今回国的除了科技人员，还有许多国外知名商业机构里的人员，不少在大投资银行工作过。相比以前，只有技术人才，缺少相配套的金融从业人员，公司发展也不易。现在各行各业的人都归国了，既有科技领域也有投资领域的，汇聚效应明显。

Simon: 所以不用 50 年，世界科技中心数一数二的不是美国就是中国。

王: 可以和王干芝赌一赌，我认为不出 30 年（中国就能成为世界科技发展中心）。

Simon: 我一定会输给你。（笑）

吴: 今天很感谢王干芝（的到来）。

王: 谢谢你，王先生。

注: 王干芝先生是汇亚集团董事及常务副总裁，主理香港及中国区投资业务。1984 年出任航天科技集团康力电子制品有限公司副董事总经理，兼美国康力公司总裁；1986 年任航天通讯集团公司副董事总经理。王先生亦曾任香港创业基

金协会主席、香港电子业商会副会长、香港汽车零部件工业协会副会长。此外，王先生亦被选为中国 2001 年及 2002 年最活跃的风险投资人。